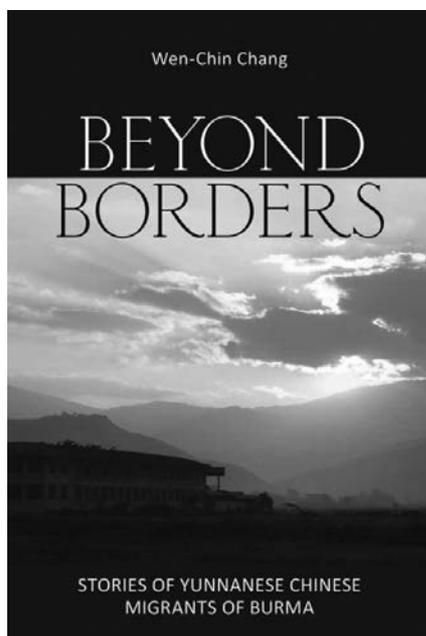


雲南之外的「雲南」

——評 Wen-Chin Chang,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 馬健雄



Wen-Chin Chang,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一 誰是緬甸、泰國和台灣的「雲南人」?

供職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人類學家張雯勤從事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多年，2014年，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著《超越邊界：緬甸華裔雲南人的故事》(*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引用只註頁碼)，這部有關東南亞華人社會的民族志很快引起學界重視。張雯勤以定居台灣的雲南人為切入點，跟蹤研究這一群體的文化特徵，以及他們所聯結的台灣、緬甸、泰國、雲南和香港、廣東各地之間的社會網絡和貿易聯繫。這一堅實新穎的人類學研究，將1949年以後從雲南流亡、長期滯留緬甸和泰國的國民

張雯勤在《超越邊界》中以定居台灣的雲南人為切入點，跟蹤研究這一群體的文化特徵，以及他們所聯結的台灣、緬甸、泰國、雲南和香港、廣東各地之間的社會網絡和貿易聯繫。

作者通過深入細緻的民族志敘述，以緬泰孤軍和以移民後裔為核心的緬泰「雲南人」社群為焦點，將他們所面對的多層次、複雜的社會文化界限，以及他們跨越這些界限的社會能動力加以描述和剖析。

黨「孤軍」(以下簡稱「緬泰孤軍」)和以他們為中心的海外雲南人社群及東南亞華人移民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對於東南亞「金三角」和緬泰孤軍等問題，媒體和學界均有所關注。但是除了對緬泰孤軍的流離悲情和對「金三角」毒品問題的好奇之外，人們對這一流離緬甸和泰北的雲南政治移民群體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從1950年代至今逾六十年，因國共內戰和隨後中國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而流亡緬甸、泰國、老撾交界的「金三角」雲南難民以及緬泰孤軍的後裔，如今已多是第二和第三代人，他們的生活狀況如何改變？他們如何維繫與雲南、台灣等地的關係？

就筆者閱讀所及，除了張雯勤的這部新著之外，尚未見到更多新的報告和學術探討。不過，本書的重點並非僅僅為滿足讀者對緬泰孤軍等問題的好奇心而已，作者的研究視野和抱負，更多是通過深入細緻的民族志敘述，以緬泰孤軍和與之相關的以移民後裔為核心的緬泰「雲南人」社群為焦點，將他們所面

對的多層次、複雜的社會文化界限，以及他們跨越這些界限的社會能動力加以描述和剖析；同時，通過探討塑造緬泰「雲南人」跨越界限的文化能動力和社會流動性的關係，進而將近年來人類學界討論的社會邊界、社會能動性，以及個人與群體的關係，放置到一個以中、緬、泰邊疆地域文化、政治地理和社會網絡為描述對象的宏大社會圖景下進行觀察和解說。

在這部民族志中，作者以講述一群生活在雲南之外的「雲南人」的生活經歷的形式，首先介紹了1949年後隨着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一批雲南邊地民眾追隨國民黨軍隊和滇緬邊境各縣地方政治領袖流亡緬甸和泰國、成為政治難民的歷史。在19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因為國內持續的政治運動和東南亞政治局勢的變化，境外「雲南人」與雲南故鄉的聯繫完全中斷，他們的生活也深深捲入了東南亞冷戰、國共之爭和緬甸的社會變革等政治漩渦當中。到了1960年代初，隨着「中緬劃界」的完成和緬甸的社會主義化運動，原



1949年以後從雲南流亡、長期滯留緬甸和泰國的國民黨「孤軍」。(資料圖片)

本由李彌掌控的境外國民黨軍隊殘部，被改編為國民黨第三軍和第五軍，開始成為流亡緬甸的「雲南人」的政治骨幹，並逐漸由緬甸向泰國轉移。隨後在越戰的背景下，這些緬泰孤軍深受「金三角」毒品問題的影響和危害，在艱難的困境中生存。前三十年間，隨着大陸與台灣關係的變化和東南亞政治局勢的發展，第一和第二代緬泰「雲南人」逐漸適應了複雜的跨國政治環境。後三十年間，隨着台海局勢逐步緩和，緬泰「雲南人」的生存境遇有了極大改善。滇、緬、泰三地貿易量大增，貿易網絡和物流的方式又發生了鉅變。

在六十多年來持續變化的東南亞政治經濟格局中，隨着「雲南人」勉力發展和經營維持的社會網絡的擴展，他們在跨國貿易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日趨重要；環境時時改變，市場網絡中「人」與「物」的關係因而長期處於持續變動的狀態；商品與物流、性別關係、資源配置方向的調整變動等因素，總在不斷重塑着這些政治漩渦中的社會活動者，同時他們也在不斷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社會能動力，因而他們的生存策略、抉擇與情感、個人感受與群體生活等等，都與其身後一系列宏觀、複雜的國家政治及經濟關係緊密關聯。

二 「流動性」、「跨界」與民族志方法

首先，本書是一本討論「邊界」和「跨界」的方式與意義的民族志。

張雯勤以精巧的謀篇布局和細膩生動的筆觸，層層鋪展開她所見的基於民族國家、族群、市場、性別、社群、宗教、親屬、家庭、朋友等不同類別的「界限」；同時，又以一個個精心布置的故事或個人生活個案，來詳述這些「界限」的穩定性或流動性與跨界的意義。重點是，這些層層累疊的關係如何將「雲南人」這一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內在聯繫穩固下來，又隨着他們的活動而擴展？這種擴展不僅是時間性的，也是空間性的。在這裏，「雲南人」主要指作者以台灣作為立足點觀察到的、1949年後流亡緬甸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那些與緬甸、泰國、台灣和雲南聯繫密切的移民群體。

其次，這也是一本向讀者（特別是對人類學了解不多的讀者）展示民族志寫作「威力」的作品，可以視為一部典範性的民族志，代表了近年來海外華人研究、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網絡、邊界人類學、雲南研究等社會人類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在人類學教學和民族志方法論的討論中必然佔有顯著的地位。在書中，作者將一系列口述歷史、人類學理論、社會史和內陸東南亞近六十年間的政治變遷，置入各章節所涉及的三代「雲南人」生活變遷的個案中，經過精心編排和剪裁，不着痕迹地建構了一套邏輯清晰的論述框架，將國家政治、貿易網絡、族群身份、性別等因素與緬甸、泰國、台灣之間的「雲南人」的社會文化建構，做了認真細緻的梳理，讀來一氣呵成，故事輕鬆自然、深入淺出，文筆清新流暢。此外，不少人類學家在面對龐雜的田

作者不着痕迹地建構了一套邏輯清晰的論述框架，將國家政治、貿易網絡、族群身份、性別等因素與緬甸、泰國、台灣之間的「雲南人」的社會文化建構，做了認真細緻的梳理，讀來一氣呵成。

作者撰寫這部民族志的目的並不僅僅要為「雲南人」發聲，其重點在於以「去中心化」的立場和角度來檢討緬甸的國族歷史，挑戰以國家政治權力為中心、任意制訂對不同的群體實行或排斥、或收留的那種予取予奪的國家政治策略。

野調查筆記和民族志材料時，常常糾纏於千頭萬緒的理論概念和民族志敘述的取捨之難，而本書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作者沒有堆砌一些晦澀拗口、生搬硬套的術語，卻能夠將多層次、複雜的跨界社會關係藉受訪者的敘述娓娓道來。

「雲南人」社群在緬甸、泰國、台灣之間的聯繫，包括他們在雲南、香港、台灣等地建立起來的貿易網絡，以及這一網絡和家庭、親屬等群體間不同類型的社會聯繫。這一系列緊密的關係網，使得跨越國家和地理空間的「雲南人」的社群認同，能夠突破各種各樣的障礙，得以長久維持。所以，這也是一本有關「流動的社群」及其關係網如何運作的民族志。「流動性」與「跨界」可以看作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本書側重以「流動性」與「跨界」的辯證關係，來理解和解釋「雲南人」在緬、泰、台之間，基於流動性和文化價值來跨越與擴展其社會關係，建立大尺度的空間關係的方法，並具體透過商品、性別關係、觀念與知識的傳遞等手段，來超越國家、市場、性別、家庭、年齡等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關係上各種各樣的界限，據此「雲南人」既能長久維繫着群體的穩定性，又能夠在不斷的流動中發展他們作為整體的社群關係。

此外，這部作品也可視為近年來有關東南亞移民研究的一部突破性的代表作。一方面，它能幫助讀者理解民族志方法是怎樣建立起有關一個社群的知識，並使之與整體上的人類學有關人類社會的知識、理解和詮釋相連接，為人類學知識

建構增添新的內容；另一方面，它也能夠幫助讀者更深入具體地理解某一社群的文化建構過程，以及他們面對倏忽萬變的世界時迸發的創造力和選擇其生存策略的意志。除了對人類學、東南亞社會有興趣的讀者之外，這部民族志還能夠幫助從事與雲南、中國西南邊疆和海外華人研究相關的學者了解「雲南」作為一種文化和一種「社會網絡」的理論研究視角。

雖然緬泰「雲南人」的案例與其他海外華人社群的生存與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殊異，但本書給予讀者的啟發就是，在雲南之外——緬甸，作者觀察到一種「雲南人」重建的或實踐的「雲南文化」是甚麼樣的：這是一個生活在跨區域狀態下的群體，他們能夠遠距離維繫相互之間緊密的親屬網絡，他們的文化策略更傾向於「熟人社會」之間那種長久維持的信任和責任，以及風險共擔的群體性。就這一社群的性別關係而言，在家庭內外，女性都扮演非常活躍的角色；就宗教與國家政治的聯繫而言，他們始終保持着靈活性來實現其趨利避害的選擇；就傳統的貿易、牲畜、對地理聯繫的理解，滇緬邊疆社會的歷史性和地域性知識傳統是整合和聯繫社群的重要文化紐帶。此外，家庭、社群內部對「闖天下」的鼓勵態度、半農半商的生計經濟傳統、群體內部的公共財產制度，成就了雲南人在雲南與雲南之外能夠生存、發展的基礎性的文化策略。

就此，作者解釋為何要寫這樣一部著作時說：

我要問的問題是：誰是這些雲南移民？他們為甚麼、以及如何能夠持續遷徙流動，其活動和貿易的範圍能夠跨越國家的邊界？這些活動又如何影響了當地的、區域性的和跨國各類結構？同時，他們持續的旅行又如何影響了雲南人的離散社群？（頁15）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借助「摩擦」(friction)、「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跨國民間領域」(transnational popular realm)、「權力的性別地理」(gendered geography of power)，以及「流通」(circulation)等學理概念來分析「雲南人」社群的遷徙和經濟活動。作者指出，撰寫這部民族志的目的並不僅僅要為「雲南人」發聲，其重點在於以「去中心化」的立場和角度來檢討緬甸的國族歷史，挑戰以國家政治權力為中心、任意制訂對不同的群體實行或排斥、或收留的那種予取予奪的國家政治策略。

三 「雲南人」網絡的運作機制

作者針對不同問題，將相互扣連的民族志材料分門別類，從歷史、政治經濟、性別關係、移民與貿易網絡等不同方向，鋪排不同的故事或個案，對「雲南人」做了既具體深入，又具宏觀視角的呈現。她在「導言」部分點出，這本書以受訪者生活史的敘述和作者深入參與受訪者的家庭生活觀察所得的細節，將緬泰「雲南人」與中國大陸

的歷史斷裂和他們家庭的分裂，植入滇緬邊疆和緬北長期的政治動亂與族群衝突的生活現實中，詳盡分析了受訪者在經濟困境壓力下採取的文化策略。作者透過受訪者的案例與區域政治地理的關係，在敘述中深入描繪了緬泰「雲南人」的流動性和跨國經濟冒險的方式與過程。

作者首先檢討了相關研究的學術史，指出前人研究的重點在於：緬泰華人中的「雲南人」移民對當地市場的了解已經相當深入全面，加之他們內部獨特的信用關係，因此對當地政治具有超乎尋常的適應能力和突出的風險承擔能力。不過，作者希望走得更遠一些，將旅居緬甸的「雲南人」做了歷史移民、季節性移民和政治難民的區分，指出其中約佔八成的旅緬「雲南人」是1949年之後的政治難民及其後代。作者決定「通過編織個人經驗，以文本化的要素來描繪他們之間相互糾纏的主體性和所遭遇的摩擦」（頁15）。她以跨地域聯繫為切入點來討論「邊疆/邊界文化」和行動的衝撞與摩擦，並指出這是一種塑造了當今世界的多樣化衝突中特別的社會互動類型^①。因而，「邊界」與流動的人群就成為整本書各章節之間的邏輯聯繫的核心，像「雲南人」這樣的流動人群所經營的跨地域的網絡聯繫，揭示了隱藏在我們的生活中或者邊緣社群中的那種「邊界的能動性」，這一討論要點超越了長期以來學術界討論東南亞高地社會時簡單化的「中心—邊緣」論述模式（頁15）。在緬泰華人社會中，「雲南人」的流動性使得離散的「雲南人」社群和他們的網絡

「邊界」與流動的人群是整本書各章節之間的邏輯聯繫的核心。在緬泰華人社會中，「雲南人」的流動性使得離散的「雲南人」社群和他們的網絡不斷擴展。作者更進一步追問，社群的長期流動性怎樣形塑了社群的離散性？

「雲南人」的「流動性」既包含了階級與社會地位之間的互換，也意味着關乎性別、身體、地理上的一系列跨越，因此「邊界」針對着不同的社會情境、對不同人的生活以及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界限而言具有不同的意義。

不斷擴展。作者更進一步追問，社群的長期流動性怎樣形塑了社群的離散性？

就全書的篇章結構而言，除了「導言」之外，作者將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移民史」（第一至四章）；第二部分為「跨國貿易」（第五至七章）；第三部分為短小的「後記」。作者在如何引導讀者理解當代緬泰「雲南人」的移民史這一問題上花費不少功夫，以引起讀者閱讀的興趣，敘述漸次深入，一步步揭示了受訪者在特定歷史境遇中交纏的主體性和傾注於生活變故之中的情感與遭遇的挫折。在「雲南人」流動的範圍與地理尺度之內，「流動性」既包含了階級與社會地位之間的互換，也意味着關乎性別、身體、地理上的一系列跨越，因此「邊界」針對着不同的社會情境、對不同人的生活以及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種種界限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意義。

現將全書各章節的要點和邏輯關聯進一步做些介紹：第一章題為「在緬甸的日子——張大哥」，本章藉受訪者張大哥的口述史，介紹了1949年以來三代「雲南人」移民如何在緬甸和泰國立足、發展的歷史。1950年至1970年代，由雲南流亡緬甸的部隊和各類邊疆地方武裝（如雲南沿邊各縣的土司及土紳團防武裝），在李文煥、段希文兩位將軍的領導下，建立了以緬甸和泰國北部為基地的國民黨第三軍、第五軍建制，即後來新聞媒體所謂的「緬泰孤軍」，他們直接聽命於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指揮^②。這一章詳細介紹了這些流亡緬甸的國民黨軍

隊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逐步從緬甸撣邦遷入泰北山區的過程。每當在一個定居點短暫停留，他們都設法建立起自己的社群生活中心和中文學校。在1970年代，他們捲入了與緬甸共產黨武裝的戰爭，期間許多人從臘戍遷到東枝，1980年代初再經景棟進入泰國北部。在整個過程中，也不斷有一些士兵和家眷遷到台灣定居。1990年代之後，他們又與雲南故鄉和緬甸曼德勒等各地的親戚恢復了聯繫。

第二章題為「糾纏的愛——貓妹」。「貓妹」是一位在台灣當研究生的撣（傣）族女孩的外號，貓妹曲折的生活經歷、生活中的摩擦與衝突的漩渦迫使她不斷地跨越各種社會文化的界限，游離在性別、階級、社群、國家等不同類別的社會關係中，這些跨越改變了貓妹的命運，也給她帶來持久的痛苦和挫折感。貓妹在緬北山區長大，從小幫家裏放牛、養馬、養騾子，童年生活就像傳統雲南農村的男孩女孩一樣。1950年，因為「官僚地主」的家庭出身問題，貓妹的爸爸和姑母不得已從昆明經騰冲逃到緬甸，一直以來，姑母與貓妹一家的關係非常密切，是她把貓妹的弟兄弟姐妹帶到彬弄華文學校上學，又帶着他們遷居撣邦首府東枝。後來貓妹考入東枝大學，三年之後獲得獎學金到台灣上大學和研究院。複雜的家庭關係驅使貓妹一直在緬甸、泰國和台灣之間奔波往還。

接下來的第三章題為「胸懷大志——父與子」，作者透過李先生父子的經歷，詳述了一家兩代人如何與國民黨第三軍和第五軍的命運

緊緊聯繫在一起。李先生出生於薩爾溫江邊的長青山，與果敢隔江相望，自認祖上來自南京應天府，是追隨南明永曆皇帝流落緬甸的果敢人。李先生在臘戌親國民黨中華學校唸完了初中，又在親共產黨的中山學校唸完了高中，隨後加入了國民黨第三軍，於1968年回到了家鄉長青山組織支持國民黨的民團武裝。1973年後，李先生離開部隊，轉行經商。在這一章中，李先生的兒子李國光的生活史也一再提示讀者，像李家這樣的「雲南人」與軍隊之間的聯繫，構成了「雲南人」社群生活的政治基礎。他們這一群人與緬北不同的政治勢力之間存在長期的摩擦，後來又直接捲入了「金三角」鴉片貿易。在整個緬北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中，這群「雲南人」不得不做出很多選擇，他們既是參與者，也一直游離於不同層面的權力關係之中。緬甸的孤立主義政治、緬北的族群政治、東南亞的「冷戰」，一再重塑了上世紀50、60年代不同類別的流動方式與方向：人群、資源、商品、資本、信息等等。李國光1980年代到泰國闖天下，還是得益於「雲南人」之間的朋友和親屬的關係庇護，基於長期的互助和忠誠，他最終也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

第四章題為「伊斯蘭跨國主義——雲南穆斯林」，強調「雲南回民」是緬泰「雲南人」中的一個重要成份。作者以回民的族群和宗教網絡來反襯「雲南人」中的內部差異性。緬甸傳統上將國內的穆斯林按來源分為四類，分別是南亞裔的嘎喇、羅興亞人、緬人穆斯林和雲

南回民，即潘泰（Panthay，緬北漢話也稱他們為「漢朝回子」），這些旅緬雲南回民大約兩萬人。跟漢人一樣，雲南回民散居緬北各地，以清真寺為中心，在各處組成聚居區。因此，雲南回民的關係網絡也依賴於中國回民普遍實行的經堂教育制度和清真寺管理制度，這又與東南亞其他穆斯林的文化不同。此外，雲南回民的親屬和貿易網絡也遍及泰國、中東、台灣、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這一章中，作者通過景棟馬爺爺、眉苗沐大爹等人的敘述，介紹了1873年杜文秀起義被清朝政府鎮壓之後，雲南回民進入緬甸的歷史、經堂教育體系、回民的馬幫貿易傳統和跨區域的通婚關係，這些聯繫成為維繫社群的基本紐帶。而且，來自緬甸的雲南回民也逐漸發展成為整合台灣穆斯林社群的骨幹力量。台灣的回民人口不多，在台北、桃園、高雄各地的清真寺中，來自緬甸的雲南回民一直是支撐宗教活動和伊斯蘭宗教教育的基本社群。伊斯蘭、中國背景、跨群體通婚等特性，成為雲南回民在不同的地方脈絡下與其他群體相區別的重要基本要素。根據受訪者的詮釋，雲南回民是「以漢從回〔教〕」的群體（頁121、125），他們與漢人一樣堅守忠、孝、禮、義的道德倫理。另一方面，在杜文秀起義被清朝政府鎮壓後，一批流亡緬甸的回民在班弄建立了緬甸回民的聚居中心。回民善於經營馬幫而且在緬甸經商的歷史久遠，因此回民馬幫商人在「雲南人」社群中起到很大的聯繫各地不同群體的作用。

伊斯蘭、中國背景、跨群體通婚等特性，成為雲南回民在不同的地方脈絡下與其他群體相區別的重要基本要素。回民善於經營馬幫而且在緬甸經商的歷史久遠，在「雲南人」社群中起到很大的聯繫各地不同群體的作用。

在第五至第七章，作者討論的第一個重點，是緬甸和泰國之間的跨界貿易的發展變化，特別在緬甸實行社會主義改革時期，「雲南人」所控制的貿易和貨物的組織流通與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影響，以及這些變化對性別關係的影響；第二個重點，是展示了自1960年代以來「雲南人」跨界網絡在緬甸玉石貿易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2000年以後，玉石貿易的網絡又再透過新發展起來的海上貿易體系擴展到了香港及廣州、揭陽等地。

從第五章開始，作者把書寫重點轉移到貿易關係。該章題為「『走夷方』——雲南的馬幫商人」，主要介紹「雲南人」的馬幫體系。馬幫其實是以騾子（即騾馬）作為役使畜力，在中國西南和東南亞山區，跨越山脈河流進行遠距離運輸和貿易。在1960至1980年代緬甸的社會主義化時期，大約80%的國內消費是在黑市上進行的，特別是在1980年代，70%從泰國走私到緬甸的貨物是馬幫經揮邦駛運到緬甸各地的。「雲南人」經營的馬幫在近三十年間一直控制着緬甸的黑市貿易。作者詳盡解釋了緬泰山區馬幫的組織、走私的貨品、販運方法和馬幫的社會網絡、交通體系，以及與社會主義時代緬甸地下經濟的關係和社會機制。此外，本章具體解釋了緬甸國內的政治變化對鴉片貿易的影響，以及從揮邦的臘戍、當陽、景棟、大其力進入泰國美賽、清邁的「雲南人」貿易網絡的運作方法。這裏我們發現在雲南與緬泰邊境之間，這一時期的貿易與流通的結算和信用體系、馬幫的組織、

有關騾馬的訓練等，一直延續了明清以來雲南各地傳統的貿易方式。就這些運作機制的歷史延續性和當代影響而言，「雲南人」的流動性、離散性和遠距離親屬關係網絡同樣也影響了緬泰孤軍和其他民團武裝的組織運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緬泰邊界地帶的國家能動性的發揮，從而影響了滇、緬、泰之間的跨國結構的延續和變化。

第六章的標題是「超越性別地理——做生意的雲南女人」，主要以邱大姐等幾位受訪者的經歷來檢視婦女在跨越不同界別時的遭遇與面臨的摩擦，從而解釋女性在面對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各式各樣的斷裂時，她們的能動力是如何迸發的。作為家庭支柱的女性如邱大姐這樣，在滇、緬、泰間跑短途或長途生意積累了財富之後，紛紛將兒女送到國外留學或送到台灣上大學。這些家庭婦女兼成功的生意人總是想方設法去跨越那些意識形態的、地理和身體的邊界。除了經營她們的家庭、在緬甸建立起來的政治經濟關係，以及親戚朋友關係網之外，跨國流離的經歷也一再勉勵她們努力打破過去習慣的社會活動空間對她們的限制，可是，這樣的突破又將她們拋入一個又一個難以預知的困境，循環往復。在這一過程中，緬甸土著婦女的經商傳統又不斷鼓勵她們參與其中，無論漢人還是回民婦女皆如此。作為讀者我們也意識到，今天生活在雲南各地的女性又何嘗不是如此？

第七章題為「玉石的貿易流通——段家和彭家」，作者將不易描述的緬甸與台灣、香港、中國內

作者討論了緬甸實行社會主義改革時期，「雲南人」所控制的貿易和貨物的組織流通與其背後的社會文化影響，以及這些變化對性別關係的影響，還展示了自1960年代以來「雲南人」跨界網絡在緬甸玉石貿易中扮演的角色。

地之間最為隱蔽的重要社會經濟網絡，通過玉石貿易做總體上的鋪陳和總結。歷史上，緬甸長期向中國輸出玉石和翡翠，而且這一直是中緬貿易中最重要和貴重的商品，同時玉石又是跨越了不同文化意義體系的特殊商品——傳統上中國人認為「黃金有價玉無價」。緬甸玉的主產地在克欽邦山區，但是隨着194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變化，玉石貿易的方式和產銷網絡都發生了巨大轉變，這種轉變在1960年代之後尤其顯著。就玉石貿易的問題，作者指出「流通並非單向性的，流通還意味着人與物的往還，信息、知識、觀念、技術、文化產品、宗教實踐等的多向流動」（頁210）。她以段先生和彭先生兩位玉石商人在緬甸、泰國、雲南、台灣、香港、廣東之間建立經營的生意網絡為例，將貿易知識和親屬關係作為網絡的基礎層，具體解釋了與「玉」這一特殊商品背後的文化價值和知識流通的複雜關係。親屬關係與生意密不可分，但是又與有關玉石的地方知識體系緊密相關，所以玉石成了最好的例子用以解釋知識、經驗、技術和文化產品之間的關係。

具體而言，「雲南人」的玉石貿易，將台灣、香港與緬甸的仰光、曼德勒和雲南騰沖、廣東廣州、揭陽等地連結為一個結構頗為嚴密的產銷體系。緬甸政府在1992年以前，將賭石合法化成為明貨，但是克欽邦與緬甸政府就玉石礦區的控制形成了長久的政治拉鋸。在玉石貿易中，廣東揭陽商人在玉石市場中也佔有重要地位，同時傳統上雲南人一直是控制玉石礦

區的主要力量。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1980年代以後玉石貿易的中心重回中緬邊界的瑞麗、騰沖一帶，但是廣州和揭陽也成為新的珠寶業貿易加工中心。作者雖然並未觸及其中的融資與加工、銷售網絡等問題，但是可以想見，玉石貿易模式的轉變涉及到中緬雙方國家政策的變化與珠寶行業的變化，同時也與雲南旅遊業的發展息息相關。

四 問題的延伸

總結而言，這本書以台灣為起點展開對緬泰「雲南人」社會的研究，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條件就是中國的內戰和國共的對立對邊疆和周邊國家的影響。作為這一政治影響的社會能動者，以滯留的緬泰孤軍為組織的內核，親國民黨的「雲南人」逐漸發展為一個特定的移民群體。無疑，華裔「雲南人」社群的成長，與1950至1980年代中國社會的封閉和緬甸的社會轉型有着密切的關係。就此而論，本書討論的「雲南人」網絡，僅限於1950至1980年代發展起來的、處於中國大陸、緬甸、泰國和台灣的政治經濟漩渦中的「雲南人」社群。畢竟，這是一個涉及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社會文化交錯與摩擦的歷史性的延續及其當代發展的重要議題，因此在本書討論之外，我們仍然懷有極大好奇心，希望理解這一歷史動態背後更加隱蔽的社會聯繫。

首先，歷史上中國與緬甸之間的貿易規模巨大，貿易網絡也非常

本書討論的「雲南人」網絡，僅限於1950至1980年代發展起來的、處於中國大陸、緬甸、泰國和台灣的政治經濟漩渦中的「雲南人」社群。近年中、緬、泰跨國貿易的飛速發展，早已重塑了緬泰「雲南人」與雲南及其他地區，以至東南亞其他華裔社群之間的聯繫。

在緬甸、泰國和台灣之間流動的「雲南人」因強大的文化紐帶的維繫而顯得特別引人注目，他們具有一種突出的集體照顧的精神，反映了雲南地方傳統中存在不同形式的集體主義文化或強烈的維持「村落共同體」的意識。

複雜多樣，這些貿易和移民網絡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更是巨大，特別是近年中、緬、泰跨國貿易的飛速發展，早已重塑了緬泰「雲南人」與雲南及其他地區，以至東南亞其他華裔社群之間的聯繫，加之隨着近年來台灣島內社會政治局面的變化，緬泰「雲南人」與台灣的紐帶正逐漸弱化。這說明，本書討論的緬泰「雲南人」社群本身也正經歷着重塑與雲南和台灣的聯繫網絡的過程。緬泰「雲南人」群體也一直處於「自我更新」的情景之中。作者對這方面的研究略為不足。其次，自1990年代以來，滯留的緬泰孤軍逐漸歸化泰國，其對「雲南人」社群的凝聚作用也逐漸萎縮；貿易方面雖有波動，但是緬泰之間的毒品、農產品和中國產工業品在1980年代以來三十年間的貿易量仍然很大，問題是，在第五章中作者就黑市貿易量的估計，還不能夠清楚解釋這些貿易網絡背後複雜的社會與政治糾葛。此外，第七章關於玉石貿易的部分，資料來源較為鬆散，有泛泛而談之嫌，不像前幾章建立在非常細緻的材料基礎上，說服力還不夠強。就以上兩點來說，本書對「雲南」與緬泰「雲南人」社群的關係的討論還值得深入探究。

不過，通過閱讀本書，我們發現，在緬甸、泰國和台灣之間流動的「雲南人」總因其間一個強大的文化紐帶的維繫而顯得特別引人注目，正如本書指出的，他們具有一種突出的集體照顧的精神。以第三章有關果敢的討論為例，從事鴉片走私的軍隊就發展了一種集體財產的管理方法：一半鴉片貿易所得為公有，另一半所得為士兵平均分

配。在同一章中，李國光的經歷對此作了更進一步的說明。當他到泰國闖蕩時，他工作的工廠被查禁，老闆也逃走了。剩下來的「雲南人」將工廠的剩餘物變賣之後，也是將所得平均分配。這樣的做法，多少反映了雲南地方傳統中存在不同形式的集體主義文化或強烈的維持「村落共同體」的意識。

「雲南人」在緬泰的案例讓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來觀察雲南和西南邊疆，我們看到，這樣的地方傳統能夠一再複製、延伸到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去，並起到了重要的維持群體凝聚力的作用。類似這樣的維繫「雲南人」社群的文化紐帶和社會機制，在支撐東南亞和台灣的「雲南人」的離散性社會網絡中的作用是十分顯著的，他們之間長期維持着相互照顧的親密的關係；在日常生活中以共同的方言、共同的地域想像來維繫群體中的忠誠與強烈的歸屬感，這些文化價值和社會實踐，都在緬泰孤軍等的生存經歷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也值得我們在作者的研究基礎上向歷史縱深及其當代變化等維度繼續探討。

註釋

① Anna L. Tsing,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覃怡輝：《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馬健雄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副教授